

增訂版序

執筆序言再版之時，適值金庸（查良鏞）先生百年誕辰，所以心情格外激動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武俠電影在邵氏兄弟的引領下，取代了黃梅調、山歌片，挾當時少見的「剛性之美」，成為華人熱捧電影種類。在這個風潮底下，金庸武俠小說順勢而起，後來更反過來成為引領武俠電影潮流的重要舵手。《天龍八部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等作品陸續被搬上了銀幕，成為華語電影的一道奇兵。

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，固然是可以從書刊銷量、電影票房等顯性數據量度，同時也有一些隱性貢獻是鮮為人知的。梁任公指出「小說之支配人道」，在於「四種力」：「薰」、「浸」、「刺」、「提」。金庸武俠小說同樣擁有這「四種力」。而且，作為現代「俠文化」的奠定者，金庸武俠小說在價值觀教育上有着隱性的貢獻，扮演着引領「群治」的角色。

諸君或以為「俠文化」不正該如此嗎？事實上，原始的

「俠文化」卻遠非今日所見那樣。

先秦時期，韓非指「俠」的特徵是擁有「武力」，而且不受限於法律。韓非的〈五蠹〉說：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。」又指「其帶劍者，聚徒屬，立節操，以顯其名，而犯五官之禁」。顯然，擁有「武力」的「俠」雖然以「節操」、「名聲」為重，但他們的行為往往與法律發生衝突。

到了漢朝，「俠文化」開始與「義」合流。司馬遷在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敘述〈游俠列傳〉的創作動機時，提及「俠」的特徵是「救人於厄，振人不瞻，仁者有乎？不既信，不倍言，義者有取焉」。雖然他認為「游俠」的行為「不軌於正義」，但是「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」。後來，班固在《漢書·游俠傳》也認同郭解般的「游俠」，認為其為人實是「溫良泛愛，振窮周急，謙退不伐，亦皆有絕異之姿」。顯然，現代「俠文化」的美好價值觀：「義」、「信」、「誠」、「謙」，正在慢慢形成。

諸君或奇怪：「謙」也是「俠文化」的精神內涵嗎？的確是！孟子在〈公孫丑〉論述「四端」時，提及「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），謙遜辭讓正是「禮」



的肇始。其實，李白在他的名詩《俠客行》中，用了更生動的方法形容這種美好品德——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」，而更有意義的是，金庸在 1,200 年之後，在他的小說《俠客行》的第一回回應道：「李白這一首《俠客行》古風，寫的是戰國時魏國信陵君門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載之下讀來，英銳之氣，兀自虎虎有威。」他用一本小說致敬這位千年前的「俠客詩人」。

先秦的「原始俠文化」，在漢朝滲入了「義」的價值觀後，漸漸更趨向「現代俠文化」的模樣。李德裕在《李衛公外集》中明確指出：「夫俠蓋非常人也，以諾許人，必以節義為本。義非俠不立，俠雖然非義不成。」在國家法律逐漸完善的前提下，加上儒家文化的長期薰染，「俠」的精神內涵已經與「儒家文化」合流了。

所謂「俠文化」，其實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，不過，在金庸武俠小說的「薰」、「浸」、「刺」、「提」這「四種力」的影響下，民眾有了一個基本共識——「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」（《神鵬俠侶》中，郭靖大俠寄語楊過之言）。

金庸曾經指出：「武俠小說中真正寫俠士的其實並不很多，大多數主角的所作所為，主要是武而不是俠。」故

此，金庸的重「俠」而不輕「武」，正是完成現代「俠文化」的轉型升級。例如在《飛狐外傳》中，趙半山曾經感慨道：「一個人所以學武，若不能衛國禦侮、精忠報國，也當行俠仗義、濟危扶困。如果以武濟惡，那還不如做個尋常農夫，種田過活了。」這不正是我們共識中的現代「俠文化」嗎？金庸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曾經說道：「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『奮不顧身，拔刀相助』這八個字，俠士主持正義，打抱不平。」「奮不顧身，拔刀相助。」換個角度去說，不就是孟子所說的「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」嗎？

金庸武俠小說的重「俠」而不輕「武」，賦予了「俠文化」符合現代價格觀的的定義。金庸通過蕭峰、洪七公、郭靖、楊過、張三丰、張無忌等角色，展示了「俠之大者」應有的崇高典範，帶出「以民為本」的傳統儒家思想，建構出光風霽月的俠義江湖。

本書在 2023 年獲得廣東人民出版社賞識，出版了簡體中文字版本。而在今年，即 2024 年，繁體中文字版本更幸運地可以「再版」。當編輯梁偉基先生告訴我時，我實在是興奮不已。一來，「再版」說明了讀者們對我的作品的肯定；二來，我有幸在金庸先生百年誕辰之時，以「書



迷」的身份添上一筆。

是次增訂，我修訂了一些錯別字以及語焉不詳的句子。同時，編輯團隊亦增加了一些圖片。在此，我必須要向廣大讀者、三聯編輯團隊鄭重地致謝。古人謂「校書如掃落葉，隨掃隨落」，錯誤永遠是核不完的，我期待大家能夠多多包涵，不吝指正。

葉德平謹識於香港教育大學

甲辰年孟夏

